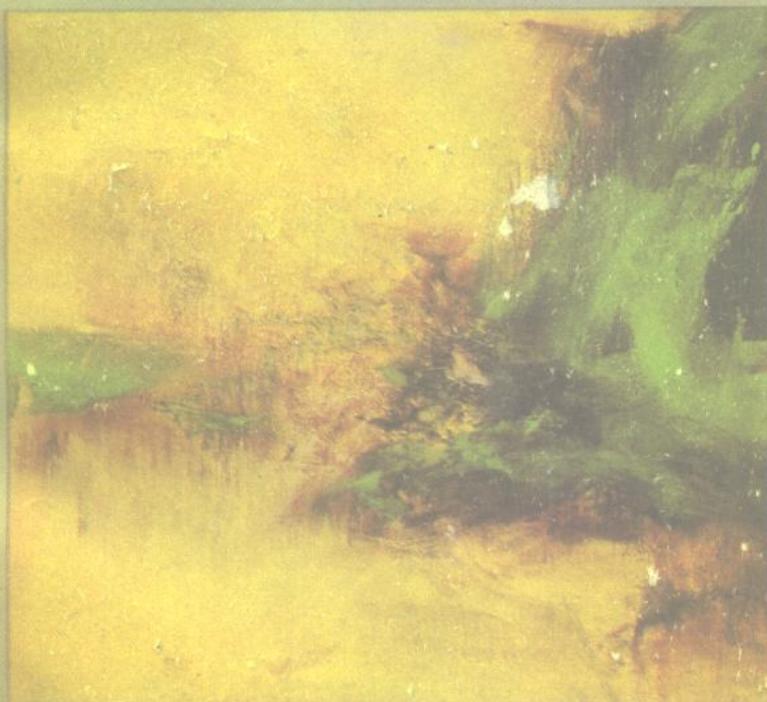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 哲学教学和研究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翻译组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 哲学教学和研究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翻译组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88

本出版物使用的名称和发表的全部材料，决不意味着表达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关于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的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者关于其边境或边界线的划定之任何意见。

作者对包括在本书内的事实的选择和介绍以及在本书中发表的意见负责，书内意见并非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意见，教科文组织对之根本不负任何责任。（本书原文于1986年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出版，比利时印刷。）

E(54/04)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
哲学教学和研究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编
(UNESCO)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翻译组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号)
新华书店经销 治金测绘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13.4印张 353 千字
1988年6月第一版 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ISBN 7—80050—009—8 / B · 3 定 价：4.20元

前　　言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在1978年举行的第20届会议，决定对世界各地区的哲学教学和研究开展一系列的考察。所选择的第一个地区是非洲，拟订了一份调查问题单并将它分送给从事哲学教育的一些机构。1980年6月，在肯尼亚的内罗毕举行一次哲学会议，讨论对这份调查问题单的反应，并且审察在该地区哲学这门学科的未来。这次考察的结果和会议的报告，随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整理，于1984年以英文出版，一、二年以后，又以阿拉伯文和西班牙文出版。

第二个要考察的地区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由于这个地区从事哲学教学的机构数量非常多，所阐述的哲学传统又是多种多样，就决定采用一种同考察第一个地区颇为不同的方法，不采用调查问题单，而采取“国家报告”的办法。我们给这一地区各成员国的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发出邀请，要求每一成员国指定一位学者准备一篇关于本国哲学教学和研究的情况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拟订了一份报告内容提纲，以保证范围全面，兼收并蓄，但为了适合有关国家哲学教学的具体情况，每位学者可不拘于格式，灵活掌握。每个报告包括对该国哲学作为一门教育学科或研究学科的历史的简述，目前情况和主要思潮，同业问题，前景和对未来的建议。这个地区的15个国家响应这一恳请，准备了国家报告，另有三位学者分别准备了一篇国家报告综述和两篇综合讨论的论文。另一位学者同意编辑所收到的各种文本。

从1983年2月21日至25日，在泰国曼谷举行了一次专家会议，讨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图景。19位国家报告的作者和参与拟写文本的研究学者之中，14位出席了会议。如因健康理

由不能出席的国家报告作者，可由另一位学者代替。此外，来自一些地区性组织和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出席了会议。

本卷书将这次考察的成果奉献给公众。它包括15篇各个国家的报告，以一篇综述作为导言。在这些国家报告之后，有两篇综合讨论亚洲范围内的哲学和文化的论文。最后一篇对曼谷会议作了说明，包括与会者名单、议程、日程安排、建议和一份讨论纪要。本书末尾有国家报告作者的生平简介。

当然，这样一本书不能是包括无遗的。并非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所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都准备了报告，而且在许多场合，报告只能对各种丰富的哲学传统的主要轮廓作一概述。为此，我们专门在每个报告后面附有文献目录，供读者进一步研究。

考察非洲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哲学教学和研究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继续一个一个地区地进行考察。1985年已举行一次专家会议，考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哲学教学和研究。对其余地区即阿拉伯国家、欧洲和北美的调查研究还将继续进行。

(姚介厚译)

目 录

前言

第一部分 国家报告综述 达雅·克里希那 1

第二部分 国家报告

澳大利亚	罗伯特·布朗	15
孟加拉国	马菲祖丁·阿赫迈德	47
中国	邢贲思	80
印度	K.S.穆尔蒂	8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雷扎·达维里	104
日本国	大森昭三	109
韩国	金烈寿	125
新西兰	J.A.帕特逊	163
巴基斯坦	英迪沙尔·哈库埃	189
菲律宾	埃默利塔·S.奎多	226
斯里兰卡	M.W.巴德玛西里·德·西尔瓦	247
泰国	维特·维萨达威特	274
土耳其	伊奥安娜·库丘拉蒂	297
苏联(中亚)	M.S.阿西莫夫 M.狄诺索耶夫	322
越南	阮才舒	353

第三部分 讨论文章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哲学：回顾和展望.....	D . P . 查多波达耶耶	370
从亚洲哲学观点看文化的语义结构化.....	井筒俊彦	383

第四部分 区域会议

参加会议者名单.....	404
会议议程.....	409
会议的建议.....	410
会议讨论纪要.....	411
作者简介.....	415

第一部分 国家报告综述

国家报告综述

达雅·克里希那

对已经收到其报告的国家，可以按照不同的看法划分为一些组，可以设定各组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性，可能共同具有它们本身的一种可以公认的同一性。例如，分组的标准可以是宗教，殖民统治，过去的哲学传统，文化区域的成员，一种激进革命的经历等。比如说，可以根据宗教将一些国家分为伊斯兰教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土耳其和苏联中亚地区的共和国），基督教国家如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印度教和佛教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泰国、日本和韩国。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有无殖民地的经历将一些国家分组，我们就会将中国、日本、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苏联中亚地区的共和国，包括在无殖民地经历的一组，而将其余的国家包括在有殖民地经历的一组。在有殖民地经历的国家中，我们还可以区分：曾是英国殖民地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曾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国家如菲律宾；另一些曾被日本占领的国家如韩国，或者历史上曾受中国和法国支配的国家如越南。对已经历一种激进革命的国家，我们可以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越南、中国和苏联中亚地区的共和国，划分为另一组，其中，后三国经历了共产主义革命，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则曾经历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革命。后三国似乎可以再划分：越南看来更倾向于苏联的共产主义革命，而中国在其革命政策中，或者至少在

其意识形态的论辩中，如果不说是反苏联的路线的话，则是执行一条非苏联的路线。苏联的中亚地区是苏联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它可被看作有别于另一些共产主义国家如中国和越南，那是由于这一事实：在它那里很久以前就发生了革命，而甚至现在，它还拥有值得注意的穆斯林人口。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一组，可以说包含那些脱离印度独立的国家，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它们在某一时期，在文化上和行政上曾是印度的构成部分。在所有这些提供报告的国家中，可以设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构成它们自己的独特的一组，因为它们的居民主要是来自英国的移民，他们感到，即便他们从地理上说碰巧住在亚洲，但自己在文化上和种族上却属于西半球，而不属于亚洲。

根据上述这些不同标准分组所表现的多样性，预示着对这些国家的哲学情况作任何认真思考，必然会遇到一些难点，提示着对已收到其报告的这些国家的各种有别的同一性，要有敏感性。然而，应当注意到，它们的差异大都是同这些国家的往昔历史分不开的。就现状而言，这些国家都分有一种派生自世界形势的共同情势，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在现时代都存在于这种形势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国家都面临同样的两难困境：怎样对待它们的往昔历史，这种往昔历史使它们成为现在的样子，给予它们自身独特的同一性，同时它们又不能依然满足于这往昔历史。理由很简单：如果它们必须生活在现代世界，它们就不得不接受当代的准则，这些当代的准则，主要是由欧洲或美国在这些领域中的活动所规定的。人们并不曾预料这种两难困境会表现在澳大利亚或新西兰那样的国家，那里居住着来自英国的移民，它们属于西方的文化。然而，新西兰的报告令人惊奇，它指明了关于该国的毛利人往昔历史的冲突；虽然澳大利亚的报告没有显示任何这类关于该国的往昔历史的冲突的迹象，但是它也并没有表明对该国哲学情势有什么较为乐观的自我意识。甚至对这两个国家来说，范型依然是英国和美国，它们的哲学旨趣和活动中心，看来是在本国之外，而不是在本国之内。

然而，这些提供报告的国家的往昔历史本身，在特性上，特别是关于哲学领域的传统，一直是极不相同的。例如印度，可以说有一种良好发展了的2000多年之久的哲学传统。而另一方面，象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国家，不仅不曾有悠久的历史，而且该国的基本哲学活动，甚至在本世纪头十年左右之前，尚未开始。还有，在这些国家历史上不同的时期，受到西方的哲学传统的不同的影响。例如，象菲律宾这样一个国家，曾有4个世纪受西班牙统治（1521年至1898年），因而可以料想它受到一般的西方思想，特别是西方的哲学思想的极长时间的影响。另一方面，泰国接触西方哲学只是在本世纪60年代初，而土耳其在1900年就有了它的第一个哲学系。此外，在阿塔杜克·凯末尔所开创的改良主义革命之后，土耳其曾有一位杰出的科学哲学家汉斯·赖兴巴赫，他自1933年至1936年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执掌教席。甚至更早一些，雅可比曾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教哲学史，并且可得到庞加莱著作的土耳其语译本了。实际上，据说奥古斯特·孔德曾给穆斯塔发·雷泽特·帕夏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试图从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的观点，对坦齐玛塔（Tanzimat）运动作一说明，希望使土耳其皈依他的“伟大的人道教”。后来，在伊斯坦布尔大学重新组建之后，象W. 克朗兹、E. 冯·艾斯特、H. 汉姆苏斯和J. 里特尔这些著名的德国教授在那里任教，直至本世纪60年代。实际上，从土耳其的报告看来，一般说法国思想家，特别是法国实证主义，对土耳其哲学家的影响，比人们通常所预料的显得更大。据报告，在韩国，最初触及哲学早在1631年。和土耳其的情况一样，许多杰出的哲学家如W.V.O. 奎因教授、S. 胡克教授和K. 洛维斯教授，都曾去那里讲课。

除了关于受到西方哲学影响的性质和深度这个问题之外，还有关于这些国家在开始受西方影响之前它们的哲学传统的性质问题。这些国家的大多数曾处在印度或中国文化影响的范围之内，自然可以料想，它们曾受到来自印度和中国哲学思潮的影响。印度的影响主要在佛教领域，这种佛教给斯里兰卡、越南、日本、韩国和泰国

的哲学传统提供了背景材料。中国在哲学领域的影响主要同儒学和道学相关。斯里兰卡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感受到佛教的影响，而泰国自13世纪以来才有佛教。朝鲜在公元前57年至公元558年之间，通过中国接受了佛教。儒学约在公元372年左右从中国传到朝鲜。日本也有同样的情形。它从公元630年至854年即佛教传到朝鲜之后，通过中国的书面译者和口译者，接受了佛教。在越南，儒学、道学和佛教也来自中国，并且在该国有1000年的主导性影响。

除了印度和中国在这一地区曾起过2000多年文化上的优势作用之外，还有一个事实：这里的某些国家曾对另一些国家起过军事支配作用。例如，中国在越南实行政治统治达1000年，在朝鲜也实行了长期的统治。日本则在1910年将朝鲜殖民地化，日本在那里统治的全部时期，对朝鲜的本土文化起有严酷的影响。这一事实的意义，须从两个角度来看：首先，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因而就有一个不仅关涉到西方哲学，而且也关涉到传统哲学的问题，这种传统哲学至少在其中某些国家看来，是同一种较早期的统治相联系的，或者说，它至少被视为不同于这些国家自身本土的传统。于是，它们就有一个中国和印度都不必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结果，在这些国家对待来自先前统治过它们的国家的现行哲学影响、文化影响的态度中，往往有一种模棱两可的因素。

持这种态度的准则，可以说是超越了其他一切准则，它涉及这里某些国家中发生的激进革命，以及这种激进革命对思想生活特别是对哲学领域的影响。中国、越南、苏联中亚地区的共和国，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可以说是属于这种类型。中国人、越南人、苏联中亚地区的人，已经历了一场共产主义革命，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霍梅尼领导下，已经历了可称为原教旨主义类型的伊斯兰革命。

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哲学传统，但是中国人民在十月革命（1949年）之后，面对如何对待旧传统的问题，从共产主义观点看

来，这种旧传统主要由反动的意识形态构成：儒学、道学和佛教。中国的报告提到在1966至1976年文化革命期间令人瞩目的形势变化，目前的中国政府努力在思想、文化和政治方面否定文化革命。在这样一种情势中的哲学，可以看到，一方面，主要关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主要关注杜绝从过去的封建结构和现今的资本主义结构中散发出来的谬误的哲学。因此，在这些国家的人民的思想教育中，意识形态的教育占有一个中心地位。因此，在这些国家的中学和大学里都教授哲学。

在越南，在院校的高年级教哲学，但是过去，在大学这一层次长久没有哲学教学。只是从1936年以来，才在所有高等院校教哲学。1967年建立了一个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在该国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协会。如今，据说有5000名教师在从事哲学教学。越南在思想方面同东南亚地区没有什么接触。和中国同样没有这种接触，因为越南虽然和中国共同有一种革命的经历，但是它不能忘却它曾受中国人支配达1000年的事实。还有，看来它所生发的共产主义鼓舞力，更多地来自苏联，而非来自中国。此外，越南同欧洲的接触看来一直是比较密切的，因此，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似乎在越南的思想史中起有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苏联的中亚地区，兼有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历史，不过前者在报告中没有提及，而对后者则提供了大量材料。这种佛教的历史似乎已被这些国家的伊斯兰化所淹没了。看来，通过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伊斯兰世界中前凯拉姆学派的唯物主义传统相联系，已获得了伊斯兰哲学对马列主义的关系调整。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哲学也有悠久的历史。然而，这里的问题看来关系到它的伊斯兰教之前的波斯历史，这段波斯的历史不仅比其伊斯兰教时期远为古老和长久，而且在文化上也无疑是丰富的，令人感兴趣的。特别在霍梅尼领导的原教旨主义革命之后，由于现行政体仅同伊朗的伊斯兰教历史相一致，就此政体而言，割绝甚或忘却波斯古经中拜火教思想所开创的这一地区的早期思想史，毫无

困难。注意一个事实，会令人感兴趣：苏联关于中亚地区的哲学教学和科学报告的报告，提到拜火教及其关于对立面斗争的哲学观念，作为这个地区哲学思想的开端，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报告全然没有提到这些哲学观念。事实上，整个中亚和西亚地区，可被视为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后伊斯兰教哲学支配的文化区域。诸如法拉比、伊本·西纳、伊本·路西德和安萨里等伟大的哲学家，并不只是这个地区任何个别国家的历史人物，而是中亚和西亚国家所处的整个地区的历史人物。然而，这些哲学家的著作大多是用阿拉伯语写的。另一方面，在伊朗讲授哲学通常一向是用波斯语，因而，即使伊本·西那曾用波斯语写过一部著作，一些论述凯拉姆学派著作的学者也使用这种波斯语，但是，也许仍然有某种关于在该国教授哲学中使用阿拉伯语和使用波斯语的关系问题。

据说，伊朗在150年以前就已开始受近代哲学影响，当时，据法国大使哥比诺的推荐，一些笛卡儿的著作被译成波斯文。一些柏拉图的著作也被译成波斯文。德黑兰大学建立于1934年，并且在其文学院中创建了一个新系，称为哲学和教育系。然而，这样设系造成了只通晓现代哲学的人和只通晓传统伊斯兰教哲学的人的分野，这种情势几乎在该地区每一个国家都有。简而言之，伊朗的哲学教学一直有传统哲学教学和现代哲学教学两种形式。关于伊斯兰教时代哲学的传统式的教学，同法学原理、教义传统、经典注释、凯拉姆学派、传统医学和天文学的教学，都在神学院中进行。伊斯兰教时代哲学和现代欧洲哲学的现代式的教学，都在大学中进行。看来，原教旨主义革命之后，“哲学教学是在神学院中进行了”。

注意到在土耳其和伊朗的哲学中，法国实证主义在它们发展的一定时期起有重要作用，那会令人很感兴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中的一个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所有其他国家所发现的一个问题，可表述为这样的问题：“西方世界从何而来，它的能力依赖于什么潜能？”换句话说：“现代性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和西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说西方在一切方面一直支配我们，我们怎样使自己从西方

的支配中解脱出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革命的本性，似乎已以某种方式解决或消解了这个问题，犹如已经历了一种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已同样解决或消解了这个问题，不过后者采取一种不同于前者的方式。在原教旨主义革命之后，可期待的伊朗未来哲学发展的唯一可能，似乎是一种对过去的伊斯兰教正宗的复归。

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情势，同另一些也已正式公认它们自己本质上是伊斯兰教性质的国家中的哲学情势加以比较，这一点会令人感兴趣。我们可以将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土耳其和苏联的中亚地区的共和国，包括在这类里。在这些国家中，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先前曾是印度的一部分，而土耳其和苏联中亚地区的共和国可谓曾有世俗革命，前者是阿塔杜克·凯末尔领导的，后者列宁领导。这两场革命既早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建立，也早于伊朗的原教旨主义革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差异看来值得注意，它们两者都深深关注它们的伊斯兰教的历史，但后者同前者相比，显得对西方哲学更为开放，并且在哲学思想上接受了一种更为多元的型态。一个正统的伊斯兰教国家在哲学领域所面临的两难困境，或许巴基斯坦的报告最确切地道破了这一点，巴基斯坦不仅力图撇开它曾是印度的一部分的历史，力图切断同那些时期的思想传统的联系，而且也力图在一切方面保留可兰经的至高权威，同时希望追随西方新近的逻辑、科学哲学和教学的思潮。与此不同，孟加拉国看来不仅显示了对其同印度分离之前的历史的意识，而且也表明，它充分评价这段历史，将达卡大学的哲学研究中心以提笑命名，纪念已故的G.C.提笑教授，他曾在该校任教。孟加拉国的报告或许比土耳其的报告更为多元，它并没有过分地集中于伊斯兰教哲学，特别是这种哲学的阿拉伯形式。

大多数提交报告的国家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涉及广义的哲学和狭义的哲学之间的区别，在广义的哲学和狭义的哲学两者之间游移不定地摇晃。一方面，人们难以将任何东西看作哲学，除非它是实质上的狭义的哲学。另一方面，除非它同普通的广义上可称为哲

学的东西有活生生的联系，否则，不能把它看作是同当代人所关注的事务相关联的。狭义的哲学在本性上主要是分析的，关注概念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以及论证同所要证实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广义而言哲学关注任何有关人、社会和自然及其同全体的关系的普遍性的见解，人们模糊地辨认这一全体，并且以想象和神话的形式勾画其轮廓。就此意见而言，这种哲学一方面同宗教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同文化紧密相关。多数的这些国家中的传统哲学，大都属于后一种广义的哲学，不过在多数国家，哲学和宗教的区分，特别是神学形式的哲学，即宗教所提供的关于真理的理性证实和辩明，同宗教本身之间的区分，很早就在它们的历史上形成了。在印度，有推理论学（逻辑学）和哲学之间的清晰区别。K. 穆尔蒂教授实际上对推理论学，“内明”（形而上学）为一方和“我明”（灵魂学）为另一方，作出了区分。在菲律宾，认为通俗哲学在于有关生活行为的格言，埃默利塔·S·奎多教授，将这种哲学当作土生土长的哲学来研究，她已报告了该国的哲学情况。实际上，据她所述，哲学的任务之一应当是“民族精神”的定形，它在菲律宾恰巧是受一种天主教的影响而注重上帝的。她试图借助于四个基本概念来表述这种人民的通俗哲学，这四个基本概念已被译为“诸事信托上帝”，“信仰时间轮迴的观点”，“与他人保持平和的关系”，“谆谆教诲互助精神”，这一哲学是建立在这种思想之上的，即个人对他人都欠了情的、欠了债的。这种思想根源来自社会中人的集体生活，这种集体生活使每个人依靠他人。据奎多教授的见解，这些基本概念就是菲律宾人的生活的潜在动力。

这个狭义哲学和广义哲学的区别问题，实际上每个国家在其自己所处的情势中都是屡次遇到的。例如，新西兰的报告也说明了广义哲学和狭义哲学的区别。广义而言，涉及毛利人的哲学，这种哲学通过部族的知识学校流传发展。该报告也抱怨大学中的哲学教学过于注重分析，同生活问题相脱离，在该国的哲学系中不注意毛利人的哲学。

实际上，狭义的哲学提出了三个问题：（1）它同一个国家的民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关系；（2）在过去和现在，它同宗教的关系，特别是在那些宗教仍然是一种活跃力量的国家里——因为现今许多亚洲国家里都是这种情况；（3）它同可称为当代社会改革和变迁问题的关系，这种社会改革和变迁构成了现时代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共同的历史形势。因而，巴塔恰利耶曾提到作为当代印度哲学中心问题之一是“生动的对话问题”，这并不限于印度一国，而是现今亚洲、非洲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生活的一般特征。然而，在报告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表述对此问题的认识的人们，看来并没有把握这个问题的确切本性。实际上，巴塔恰利耶教授已指出了这个问题的另外两个方面，可以用来补充上述提到的三个问题，他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即关于理解西方哲学而不必分有它所根植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只是一种普遍性问题的一个特殊事例，这种普遍性问题就是，理解者在理解任何一种文化（包括该文化的多种多样的产物）时，却因缺乏在此文化中的实际生活而理解不足。巴塔恰利耶教授还提到一个问题，即如果缺乏与在科学领域追求知识的人的“生动对话”，那么，讲授或理解科学哲学的有效性又会怎样呢？

这个关于理解科学哲学的问题，已被一些人在报告中提出来了，他们强调在哲学研究中迫切需要引入某种自然科学主题或社会科学主题，这样，自然科学哲学或社会科学哲学，除了涉及一切领域的概括的认识论问题之外，还会包括某些有意义的具体内容。至于哲学同社会相关联的问题，或哲学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问题，这是一个较大的几乎关涉到现今全部理论知识领域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在哲学领域中还有更大的重要意义，因为人们还不很清楚，哲学除了以一种很间接的方式之外，在社会情势中还可能起什么有用的作用。实际上，几乎在所有的报告里，都有这样一种普遍的抱怨：哲学不是学生容易通晓的学科，学生们和雇主们都发觉它同就业目的不相干，它也并没有以某种有效的方式显得同这些国家中正在进行的社会变迁过程相关联。只是在那些经历了一种激进革命的国家，

其社会变迁方向非常清晰的国家，才没有上述那些对哲学的否定态度。在绝大多数我们已收到其报告的共产主义国家，把哲学当作在各种学校层次上教学的一种基本学科，并且看作是在人的理论事业和实践事业中的中心学科。在这些国家，研习哲学的学生获得工作也不困难。越南、中国和苏联中亚地区的共和国的报告都以鲜明的方式肯定了这点。然而，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有相似的情形，那里已进行了不同类型的革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报告明确地陈述：

“如今，在革命中，伊朗哲学有着世界上任何国家无可比拟的地位。如今哲学书籍大量地出版，过去，要是一本书出版2000册，会在书店里积压好些年，而现在一本书可出版5万册或10万册，几个月就卖光了”。

因此在那些经历激进革命的国家中哲学的地位，与那些不曾有激进革命并且在哲学领域中多少具有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哲学所拥有的地位，是根本不同的。

除了同一性问题和相关的如何同本国以往的思想传统相调和的问题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几乎所有这些提供报告的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即知识赖以传授和创造的语言问题。一方面认为，除非以有关国家的生活语言来从事教学和研究，否则就不能出现真正的创造性。另一方面不安地认为，这些人民的语言如今对严肃的哲学论述，并不是合适的媒介工具，决不能同那些借以从事当代哲学探讨的国际性语言如英语、法语或德语相比，甚至不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性语言相比。这种情况适用于那些国家的往昔思想传统借以体现的语言，同样适用于真正的哲学创造力被认为现代才发生的那些外国的语言。因而，翻译梵文和中文如同翻译英文、法文和德文一样迫切需要。例如，韩国的报告提到有着5万本中文的朝鲜哲学著作有待翻译成现代朝鲜文。印度的情形甚至更为复杂，因为那里有许多地方语言，每种地方语言都以类似的方式遇到这个问题。印度中央政府承认至少有11种语言是该国的重要语言，另一些地区语言的中心也要求得到这种承认。几乎每个邦都确定其本邦的语言地